引　言

交通的进步，是人类迈上文明阶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社会文明的成熟和飞跃，仍然必须以交通事业的成功作为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文明的进步，当然也构成有利于交通逐步发达的积极因素。

回顾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交通发展的轨迹同时历历在目。在文明史历程的每一步，又都可以看到交通条件的不断完善。交通的进步，总是同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同社会生产的发展，同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同精神文明形式的演进，呈现同步的趋势。

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文明圈的规模，同时也影响着各个文明圈之间的联系。交通系统也是文明国家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文明的一切成就，如技术的革新，科学的发明以及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迅速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历史的前进。相反，在交通落后，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其他地区已经出现的文明创造，往往又需要重新开始。历史上曾经发生曾经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曾经表现出灿烂成就的文明，但由于与其他地区交通隔绝以至终于走向衰落灭绝的实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交通的形式，也对文明的内部结构发生重要的影响。其作用可能仅次于生产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交通形态与中国文明的特质有重要关系。

中国文明的较早成熟，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交通条件的便利作为基本条件的。华夏文化共同体的早期形成，也是以不同文化区域间交通联系的日益密切作为基本背景的。不过在这个地理条件复杂的古国，山川险阻对交通发展的严重限制，使得许多地域的文化风格各自表现出独有的特色。而交通进步所受到的阻碍，对于文明形态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儒学行为规范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老子文化学说所谓“不出户，知天下”（《德经》第四十七章），长期对中国人传统心态某种定式的形成表现出重要影响。人所周知，大洋与大漠的交通阻限以及政府“海禁”与“闭关”等政策，使中国文明未能发生更广泛的世界影响。但是在中国古代民间商运等交通形态相对落后的另一面，人们又可以看到服务于军政体系的交通结构其设置之完备与效能之卓异，曾经明显表现出领先于世界的水平。驿道与驿站等设施和机构组成的驿传系统，是有助于高度集权的大一

统的专制主义王朝建立和健全政治管理体制，切实强化武备，及时断决军机，以完善统治机能，提高行政效率的基本条件之一。高效能的驿传系统，也影响着社会生活中信息传递方式的进步，促进了民间交通交往活动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认为，人体有经脉和络脉相通贯。经脉如径路，形成纵行的干线，络脉如网络，构成横行的分支。经络内属脏腑，外络肢节，相互纵横交叉，循行内外，成为联系全身，运行气血的通路。许多至今难以作出圆满解释的人体信号的传递过程，也是通过经络而得以实现的。

古代驿道与驿站等构成的驿传系统，恰如通贯中国文明体系的经络。中国文明的生机与活力的焕发，也体现出驿传系统的作用。中国古代驿传系统的较早形成，以及较早具备了相对完备的结构形式，较早表现出相对迅捷的工作效率，是中国文明创造的杰作之一。讨论中国古代驿传系统的形制、特征及其历史作用，无疑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古代许多有关的历史文化现象，从而更真切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若干特质，更具体地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真实历程。

一、驿道驿站的早期形式

在原始社会后期，远古先民们在为文明奠基的同时，创造了信息传递的初期形式。

史前文化的科学考察，发现年代愈为古远的文化遗存，当时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愈为明显。甚至相距不远的人类居住遗址中同一历史时期的出土物，也表现出各自相异的鲜明的特征。

例如，在对陕西关中及其相邻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进行考古研究时，发现陕西华县老官台、元君庙，宝鸡北首岭，西乡李家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相继获得的发掘资料，从分布地域、层位、年代数据，以及从类型学的角度进行综合考察，都可以确定为，以关中地区为中心而早于仰韶文化的各有独自特点的原始文化。这些文化，曾经被命名为“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早期的北首岭类型”、“李家村文化”、“大地湾文化”等，然而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虽然有所不同，却大都处于后来仰韶文化分布的区域内。也就是说，随着年代的推移和历史的进步，原先文化特征不同、文化风格各异的社会群体，可以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文化共同性。这一过程，应与《尚书·尧典》所说到的“九族既睦”，“协和万邦”的历史演进相一致。

这一过程，当然是通过交通交往的发展而实现的。随着交通交往的发展，驿传系统的雏形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存在。

1. 黄帝“合符”传说及其背景

传说黄帝以“轩辕氏”为名号。“轩辕”，原意指车辕。“轩辕氏”以及“轩皇”、“轩帝”，用以称谓后人以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著名帝王黄帝，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突出的内容。

据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在轩辕所处的时代，各个部族相互“侵伐”，百姓受到残害，轩辕于是习武行兵，征讨好兴不义之战的部族，受到天下的拥戴。在相继战胜炎帝、蚩尤之后，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据说黄帝不惮辛劳，游历四方，行踪十分遥远，他曾经东行至于海滨，登丸山与泰山；又西行至于空桐山，登鸡头山；又南行至于长江，登熊山、湘山；又向北方用兵，驱逐游牧部族荤粥的势力，“合符釜山”，在涿鹿附近的平原修筑城邑。然而长期迁徙往来，没有确定的居地。黄帝行政的主要内容，是“抚万民，度四方”。他通过以交通实践为重要内容的行政努力，据说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

所谓“合符釜山”，有人解释说，是“合诸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司马贞：《史记索隐》），就是说，召集诸侯在釜山这个地方朝会，届时验合其“符契圭瑞”。“圭瑞”，是玉制的符信。一般所谓“符契”，则是古代多作为交通凭证的信物。古代符信最常见的有所谓“符节”，多用金、玉、竹、木等制成，上面刻写文字，分为两半，使用时以两半相合为验。《周礼·地官·掌节》说到这样的制度：

> 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

即通过关卡使用符节，通过物资使用玺节，通过道路使用旌节，都规定有严格的期限，届时要对“节”予以重新验合。《墨子·号令》说，往来行者在出入门关时，必须向守卫人员出示“符传”，如果没有“符传”或者“符传”可疑，则应当拘押到官府进行审查。“符传”，就是出行时必须携带的护照或通行证。这种制度沿用的年代十分长久。《明史·职官志三》说，当时亲王前往藩国或者文武官员行赴任所，以及“行人通使命者”，都颁发“符验”。《明会要·舆服下·符节》又有关于使用“调发走马符牌”的记载。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城西录》中，又曾经说到当时使用的所谓“通商符券”。

看来，如果我们推想黄帝“合符釜山”传说的形成，体现当时已经出现后世交通“合符”制度的早期形式，是有一定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先古圣王舜的传说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事迹。例如，汉代大学问家班固在《白虎通·瑞贽》中写道：

舜始即位，见四方诸侯合符信。

就是说，舜取得统治天下的权位之初，就会见四方部族领袖，实践了“合符信”的仪礼法度。显然，远古时代已经开始出现的与“符”有关的礼俗制度，体现出一种倾向于信息集中、政令通达的文明要求。这虽然首先表现出当权者的一种政治意志，但同时也反映了走向文明的社会进步的历史方向。通过一些距远古文化未远的少数民族的风习，也可了解“符”以及“合符”的意义。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马龙州》记述，当地居住的民族有“僰”和“罗罗”，而又尤以“罗罗”为多，他们不识文字，凡有交易、借贷等交往关系，“辄以片木刻其物品、日期、多寡之数于上，析而分之，彼此各藏其半，以取信”。记述者以为，这种习惯“亦上古之遗风”。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也写道：滇南倮倮俗无文书，官府征收赋税，一般刻木为符，以刻线长短标志数额，然后中分为二，官府持其中一半，届期凭此征收，往往“符合不少迟欠”。刘献廷又说，由此使人联想到远古时代的“结绳之制”。云南察瓦龙土司曾经使用“木刻”向独龙人传达命令，由头人逐村转送，内容大多为调发劳役、征收税金等。这种木刻有时附有箭、鸡毛、辣椒、木炭等，以示紧急。独龙人自

己相约于异地会面时，也往往刻木为信，在木棒的两边刻有相等的格数，从中间剖分为两半，双方各持其一，每天削去一格，最后可以如约相会。独龙人在通知集会及进行军事动员时，也曾经使用“木刻”。一边用缺口表示人员数额，另一边用缺口表示行程日期。领队者持此“木刻”，行走一天削去一个缺口，当缺口全部削掉时，则可以如期抵达约定地点。也有忘记削去缺口，以致迟到的。独龙人也曾经使用结绳预定日程的方式，如约定开会时间，召集人或发起人用麻绳系结，派人送出，接到的人立即出发，每行一日解开一结，绳结全部解开，预定日期也就到了。独龙人每逢年节，邀请远方亲朋前来作客，普遍采用这样的记日方式。他们结绳发出通知，约定时日。而主人也同样结绳，悬挂在竹篾墙上，每天解开一结。待绳结都被解开时，即欢天喜地，礼迎客人。

在独龙人居住的地区，交通条件相当落后，登山攀行“天梯”，过江通过“溜索”。刻木结绳约定相会日期，说明行途路线总长及每天的行程，都已经大体确定。直到今天，独龙族人对以结绳形式约期会兵攻打察瓦龙土司，并终于获胜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据回忆，也曾经发生独龙族与怒族约定时间一同攻打在察瓦龙土司辖境内的糯尔马宋，然而怒族途中忘解一绳结，迟到一天，因而失败的故事。

与此相应，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到传说时代这样

的史事，《国语·鲁语下》：

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说禹召集联盟的各部族首领相会于会稽之山，防风氏迟到，禹将其处死，并陈尸示众，以示儆诫。这一故事非常著名，以致清代文学家孔尚任在《桃花扇·迎驾》中也写道：“莫学防风随后到，涂山明日会诸侯。”所谓涂山之会，又杂入了《左传·哀公七年》中所记载的这样的传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汉代学者张衡在他的名作《思玄赋》中于是写道：

朝吾行于汤谷兮，从伯禹于稽山。

集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

据唐代学者李善的解释，这里所谓“食言”，是指“违命后至”。或许通知“诸侯”、“群神”的信使，是曾经拿到某种允诺如期赴会的回执而复命的。所谓“执玉帛”、“执玉”，可能是指持有“玉符”，其作用或许在于标识身份、地位，或许也类似于独龙族通告约期的“木刻”。防风氏“食言”失期，“违命后至”，竟然受到如此严厉的惩处，说明以所谓“符”来传递信息的制度，形式已经相当成熟，效能也已经相当显著。

2.“聘以知远”的资质与“合和万国”的成功

传说时代的先古圣王，大多比较重视以交通增

益对于天下的认识，通过对交通行为的控制、对交通制度的建置，以扩充其文化信息的拥有量。

《史记·五帝本纪》说到黄帝的事迹时，赞美他：“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也就是对于天地万物的知识都能够劳心尽力，倾听毕览，于是方能够领导“监于万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实现空前的政治成功。帝颛顼高阳有“疏通而知事”的美名，他的政治影响也更为远阔，据说北至于幽州山地，南至于粤海之外，西至于河西荒漠，东至于沧溟远岛，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临的一切，都归属于他的统治。帝喾高辛更有“聪以知远”，也就是其才智能力可以集中远方各种信息的称誉。帝尧“其知如神”的传说，当然也体现了他所处的时代，对于掌握较多文化信息的王者的尊崇。他可能正是主要凭借这一优势，实现了“九族既睦”、“合和万国”的成功者。

关于尧的事迹，我们又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 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墨子·节用下》）
>
> （帝尧）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淮南子·主术》）
>
> 尧存心于天下。（《说苑·君道》）
>
> 尧眉八彩，是谓通明。（《白虎通·圣人》）

都强调尧以“通明”的资质，也就是信息网罗和信

息处理的特殊能力，“存心于天下”，“勤劳天下”，从而得以“治天下”的业绩。

司马迁对于舜和禹也有“明通四方耳目”（《史记·五帝本纪》），“声教讫于四海”（《史记·夏本纪》）的赞美，说明同样的政治文化现象。

一方面“明通”“四方”的信息，一方面又将“声教”推向“四海”，这样的文明过程，显然是通过与后世驿传系统相类似的社会结构的作用而实现的。

与更早期的文化形态进行对比，人们会惊异地发现，距今时代更为久远的部族联盟领袖的名号，竟然有称作“浑沌”（或又写作“浑敦”）的：

> 浑沌无面目。（《山海经·西次三经》）
>
> 中央之帝为浑沌。……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
> 有目而不见，行不开，有两耳而不闻，……天使其然，名为‘浑沌’。……空居无为。（《神异经·西荒经》）

原始社会前期，确实曾经经历过一个人们对外来信息反应极其愚钝麻木的时代。这就是屈原《天问》中所谓“冥昭瞢暗”以及“何阖而晦”的时代。《庄子·马蹄》说：“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至。”又《应帝王》说：“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而《盗跖》又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都体现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形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文化特征的表现，即生活节奏极其缓慢，交通意识十分淡漠，以致各种信息几乎无从往来传递。《淮南子·精神》所谓“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溟濛鸿洞，莫知其门”，也形容了当时的情形。《淮南子·主术》又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也说到交通的作用和信息的意义，当时都还没有受到重视。汉代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齐世》也写道，人民“卧者居居，坐者于于”，是“宓牺之前”时代文化的特征之一。从“浑沌”到“通明”的演化，说明了历史文化的进步，说明其文明历程已经在逐步走向成熟。

对于这样的历史过程，早期驿传系统的作用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但其积极的历史影响已经显现。

3.“义舍”和“义米肉”

东汉末年，张角等人以“太平道”组织民众，发动了摧毁汉王朝统治根基的黄巾起义。与此同时，张鲁则以“五斗米道”组织民众，在汉中建立了事实上已经实现政教合一的政权。当时其教民称为“鬼卒”，首领称为“祭酒”。张鲁在汉中曾经推行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其中与交通有关的内容尤为引人注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 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

就是说，各地教民首领与行政官员职任兼于一身的“祭酒”，都在自己所管理的地区设置所谓“义舍”，其形制类似于当时政府经营的交通机构“亭传”。又置办所谓“义米肉”，悬挂在“义舍”中，行路的人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取用，但是如果消费过多，则将受“五斗米道”宗教神秘力量的严厉惩处。

南朝宋人裴松之为《张鲁传》作注释时，又摘引《典录》一书，其中也有有关的内容：

> 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

也说到张鲁推行的作“义舍”，置“义米肉”于其中，以服务于行旅之人的制度。据说当时还规定，犯有轻微罪过的人，应当修治长度为 100 步的道路，这样即可以得到恕免。这一制度显然体现出浓重的远古时代的遗风。历史尽管已经演进到秦、汉时代这种文明相当成熟的阶段，在某些边远荒僻的地区，大约依然可以看到若干古制与古风的遗存。

近世民族学资料也体现远古交通形态的若干特征。例如，许多少数民族都保留着热情款待来往行旅之人的礼俗。如在景颇族地区，对行人旅客都留食留住，视若家人，行途中只要走进景颇人的寨子，就不愁酒饭。他们称这种招待为“恋恋必作”，意思是“免费的饮食”。

独龙族的住宅，当主人不在家时，远途客人可

以打开门进去，烧火煮饭，并不会受到责难。但是一般要等待主人回来再启程。主人往往邀留行客畅饮停宿，第二天上路时，又送给客人一包饭，以备中途食用。通过这样的民间礼俗，可以想见与“义舍”、“义米肉”有类似之处，但年代可能更为遥远的交通制度。独龙族还有这样的风习，行旅远出，把所携带的口粮分装在小麻布口袋中，沿途悬挂在路边的大树上、岩洞里或者哨房中，归返时逐袋取下煮食，从来不可能意外遗失。其他过路行人，无论怎样饥饿，也绝对不会擅自取食。这种形式，可能比设置所谓“义舍”、“义米肉”，应用的年代更为古远。

门巴族又流行这样的风俗，出门远行，在途中遇见大而平正的石头时，要放几粒粮食，如玉米、荞麦、蔓加等在石头的表面，他们称此为“不累拉”，据说如此可保证一路平安。这种作法，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远古类似备置“义米肉”等为行旅者无偿提供饮食的礼俗的遗存。

类同于“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的作法，在民族学资料中也有所反映。

例如，阿昌族惩罚犯有过失的人，有时就让他挑 30 担砂子，铺 30 米的道路。这种风习，有时又可以看到某种演变形式。例如，广西地区仫佬族没有子嗣的人，往往出资架桥。纳西族也有求嗣的妇女参与架桥的风习，她们以为修桥之后，即可以实现生儿育女的心愿。努力从事交通建设的行为所表

现的行善祛恶的意义，可能起源也非常久远。

藏族往往在路边堆积石块，称之为“玛尼堆”。蒙古族则称之为“鄂博”、“敖包”。土族则称作“雷台”。其性质，可能在于设置道路标识。门巴族把垒这种石堆称作“玛尼朵个”。在山口、村头和许多重要路段，都可以看到插挂有经幡、彩带、布条的石堆。他们行旅途经此地，大都手拾石块置放在石堆上，也有人在这里专心系挂上事先准备好的经幡和彩条等。这种道路标识具有宗教意义，可能是时代相对晚近的事。不过，这一事实也可以说明为重要道路建置路标，可能很早就是十分郑重严肃，被赋予某种神秘意义的行为。

古代所谓“封”，性质可能与此类似。《庄子·齐物》说：“夫道未始有封。”这里所说的“封”，一般解释为“封域”、“限域”。“封”的原义是堆聚土石，作为某种界域的标志，因而又称作“封表”。在交通道路上的“封”，据说又有分程记里的作用。西汉名将霍去病率军远征大漠以北，破匈奴，“封狼居胥山”（《汉书·霍去病传》），东汉时，窦宪、耿夔等击溃匈奴，深入北方荒漠追击 3000 余里，“铭功封石”而还（《后汉书·南匈奴列传》），都是以“封”作为永久性纪念形式的典型史例，但是“封”的原始涵义也可以由此得到说明。古代的交通道路管理，曾经有以所谓“封堠”划界分程的制度，据说五里一封堠，十里双封堠，有的学者引据经典，指出黄帝游幸天下时，“道路有记里堆”，因

而以为“封堠”之制，启始于黄帝时代。（〔明〕杨慎：《丹铅总录·封堠墌埻》）这样的分析，可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二、商周国家的成立与最初的邮驿系统

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国家权力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宰。出于行政管理和经济统制的需要，最初的邮驿系统开始形成并且表现出效用。

夏代历史在史籍中的记载多有传说的色彩，对于有关夏代历史的文物考古资料，人们的认识也并不一致。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夏王朝的创始人帝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记载，但是讨论夏代驿制的条件显然还不成熟。《左传·定公元年》说到，奚仲曾经担任夏王朝的“车正”。可见夏代已经设置专门管理车服诸事的称为“车正”的官职。不过目前还没有资料可以说明这一官职的责任和驿传体制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对于商周时代邮驿系统的形式的分析，认识驿道驿站历史演进过程的初期阶段。

1．殷商的驿传制度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作为当时的重要档案文书，其中已有“行”字。先秦文字“行”指大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